

文庫博物館專集（五十七）

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世纪了。回眸本世纪，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的，是1966年至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文革已经渐渐地被人们所淡忘，不要说如今的年轻人对它一无所知或者所知甚少，就是我们这些过来人，我们这些在十年浩劫中经历过死亡、鲜血和眼泪，付出过青春、狂热和绝望的一

代人，回忆文革也恍如隔世。文革，人们不再谈论。可是，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家人、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哪怕有一点点责任心的话，在离开本世纪的时候，也不能不问一声，我们，中国人民，有能力阻挡下一次文革吗？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先生夫妇被几个彪形大汉架上批斗台，弯腰低头，双臂后伸，就是当时流行的“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在口号声中，刘少奇先生要遭受语录本的不断拍打。会后，他的一条腿已被打伤，鞋被踩掉，只穿著袜子。当他被押回办公室的时候，他拿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两年多以后，1969年11月12日凌晨，在河南开封的一个戒备森严而不为人知的屋子里，刘少奇先生孤独地、没有一个亲人和战友在身边，溘然与世长辞。他身上盖著白床单，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都变形了，下颌一片瘀血。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想了些什么，已经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无从猜测，作为这个国家的国家主席，他是否看出了，文革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是否想过，如果他得以劫后余生，活到了他被平反的一天，重新成为国家主席，他将作出怎样的努力来防止文革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以免他和他的人民“受二遍苦，遭二茬罪”？文革浩劫，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为什么上帝把这样的苦难降临到我们这个数亿人口的文明古国头上，为什么让我们这个民族饱受创伤，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善良的平民百姓，无数个家庭，在十年的时间里受尽磨难？

对于象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有象遇罗克和张志新这样在文革中被剥夺了生存权的人，或者，对于那位沐著京城的夕阳一步一步走入太平湖的作家老舍，还有在上海的深夜全家静静地躺在地板上打开煤气开关的天才钢琴家顾圣婴，对于这些为了不失去人的尊严而放弃了生存权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上面的这个问题已经无关紧要。他们已经把这个世界留给了我们这些活著的人们。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明白了吗？我们知道文革浩劫的症结在什么地方了吗？我们有能力阻挡下一次文革了吗？

要回答这一个问题，先让我们问另一个问题：是谁结束了文革？

1976年是文革结束的一年，尽管已经经历了十年的荒唐和动乱，尽管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尽管所有的人对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口号已经深感厌倦，尽管有了地下的反抗的行动和反对的声音，尽管我国还遭到了本世纪人类所遭受的最大的自然灾害——唐山大地震，尽管有了这一切，但是，结束文革的却不是任何人为的力量和行动。真正结束文革灾难的是自然规律，凡是人都要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在那个时候，几亿中国人民并没有能力结束这场谁也不愿继续下去的运动。

八十年代初，在一次全部是著名科学家和著名学者的聚会上，劫后余生备受敬重的老先生们说起了文革的荒唐和苦难。可敬的老人们大多从57年开始受折磨了，说起文革中的批斗、关押、妻儿离散、劳改、饥饿和贫病，却仍不失乐观和幽默。文革是那样的荒唐，即使是亲身经历和受害者，事后说起也不能不噙著眼泪笑作一团。最后，大家一致地说，这样的运动是再也不会发生了，再也不会了，它实在太荒唐了，荒唐得简直岂有此理。

真的不会发生了吗？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把握？就因为文革的一切荒唐透顶？那么为什么在那十年里我们这几亿人就不觉得它荒唐呢？既然我们那个时候会让这一切荒唐发生，让荒唐持续了整整十年，只有上帝才能让我们解脱，那么，以后我们就真的有能力阻挡文革这样的荒唐的事情发生了吗？

前不久，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的全国人大的修宪，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至今最贴近的回答：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的国家。

只有法治的国家可以避免文革这样的灾难，只有法治国家的制度有能力阻挡文革这样的荒唐。

1999年夏天的席卷全国的一场运动，又给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注解。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有朋友和我争论，他们非常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在朋友中一贯批评科学界和教育界特别是北京的高校、包括中央党校，对严新、张宝胜的特异功能的过份渲染，而现在对批判李洪志和法轮功却闭口不言？

难道我们真的那么容易就忘记了，在三十多年前的文革初期，面对著揭露出来的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牛鬼蛇神”，我们也曾经跟著一起喊过打倒打倒的口号，也曾经挥舞过红宝书，也曾经愤怒得热血冲头，也曾经激动得热泪盈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后果，我们所作的孽，又统统由我们自己领受了下来。而那个时候毛泽东自己是很明白的，他说他是“和尚打伞”。可惜我们不知道毛泽东的话，他的话是对美国人说的，而这个聪明的美国人把它解释成，毛主席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的雨中的僧人”。

西方人说，骗你一次，是他的耻辱，骗你两次，是你的耻辱。

本世纪的这最后一场群众性的大规模运动，是文革发端的快速回放。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倒可以借此机会看看文革的荒唐是怎样荒唐起来的。通过这次快速回放，我们应该多了一次机会，看到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法治的国家制度，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最关键的原因是：极端集中垄断的覆盖一切的一手遮天的没有制约的政治权力，是非常危险的。这样高度集中的权力在空间上集中到几间房子里，集中在几个甚至一个人的手里。它的唯一好处是决策的效率非常高，很困难的抉择也可以在短时间甚至一霎那作出。但是这种决策效率的收益和它的危险性不可同日而语，为此付出的代价无法计量。这就是现在的权力集中的国家都是落后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只要这样的权力结构依然存在，那么文革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当这样的权力一旦打算发动文革这样的运动，就没有人有能力阻挡，不管它所发动的运动是“合情合理深得民心”的，还是荒谬透顶遗患无穷的。

一个法治国家的制度必须让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功能和权力形成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合理分布的互相有所制约的结构。从而，由于有了结构上的互相制约，这个制度的运作就必须遵从一定的程序。这个制度中的每一部份，以及这个制度下面的民众就可以对这种互相制约和程序的遵循程度实行监督。任何人都没有一手遮天的权力，任何部门和官员越出法定程序的做法都行不通。只有这样，法治才有了制度的保证。只有这样，文革才可能被阻挡，不管它是不是荒唐透顶。

不少朋友在批判“邪教”的时候，提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维柯的大伟教派，以及制造了东京地铁毒气案的奥姆真理教，说“邪教”危害社会，西方政府也是不能容忍“邪教”的。

我在这儿的“邪教”两字上打了引号。打引号麻烦一点，但是很重要。因为“邪教”这个说法，只是我的朋友们在想当然，是只从我们的中央大报上按照宣传部

的意图来了解西方的结果。根据美国宪法，民众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对政府则有政教分离的规定。政府没有权力干涉民众的宗教信仰，当然也没有权力来评定或指责某一些人的宗教活动或某一些宗教是“邪教”，那儿根本就没有“邪教”这一说法。维柯的大伟教派不是“邪教”。同样，奥姆真理教也不是“邪教”。他们都没有被取缔，也没有人有权力取缔他们。六年前发生在维柯的导致大伟教派死亡80多人的事件，起因是联邦烟酒火器管理局怀疑大伟教派非法屯积武器，在得到法庭许可进入大伟庄园搜查时，遭到教徒反抗，造成四名联邦官员被击毙丧生，这才有联邦调查局等单位介入。

巧是也巧，正当我们这儿说起法轮功是“邪教”的时候，美国国会正在对六年前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处理大伟教派的程序进行再次调查。在六年前那起事件以后，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长已经在国会调查中受到强烈的质疑和批评，因为事件的后果是80多人，包括其中的20多个儿童丧生。但是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对国会保证，大火是从大伟庄园内部烧起来的。联邦调查局所发射的催泪弹是不可燃烧的催泪弹，不会引发火灾。六年以后，最近，联邦调查局的证据表明，在处理这个事件过程中，联邦调查局发射过军用的可燃催泪弹。尽管至今为止表明这些催泪弹是在大火以前数小时发射出的，不可能是催泪弹引起大火。但是这一新证据已经引起国会震怒。立即要求司法部长作出解释。司法部长雷诺也表示非常震惊，发誓一定要调查个水落石出。不是调查大伟派“邪教”，而是调查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运作程序。

国会有议员提出，雷诺没有能力调查她下面和司法部内部的违法违规行动，要求雷诺为此辞职。雷诺表示，她将任命司法部外面的独立调查单位来调查。国会已经定下了要求司法部长和有关官员以及联邦调查局官员到场的听证会。估计这一调查要持续几年。现在它是美国民众每天的重要新闻。我们从网上也可以知道它的进展。

那么，对于大伟教派或奥姆真理教的危害社会的活动，政府要不要管呢？这里要解决的头一个问题是，由政府的哪个部门管，按照什么程序来管。民众中的某些人的犯罪活动，只有按照一定的司法程序来管才是合法的，否则，“管”的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不管他“管”的对象是多么的“荒唐”、“邪恶”。如果只是因为某些人的言论和行动照你看来是非常“荒唐”和“邪恶”的，只是因为那些人在你看来是坏人，你就默许和容忍了政府部门不按照法律程序来“管”这些人，那么不管目前的这一“管”在你看来是多么的合理和必要，你实际上已经使法治的大堤漏水了，它的崩溃随时都会发生。

大伟教派的剩余人员，东京地铁毒气案的嫌疑犯，都是在法庭上按司法程序判决的。法庭判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犯罪个人和犯罪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被告的辩护和上诉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而教派本身，如奥姆真理教，仍然是合法的宗教团体。

这样的互相制约并有程序约束的受民众监督的政府制度是我们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初衷。我们有人民选举的人大负责立法，有各级行政部门负责行政事务的管理，有独立办案的司法部门。我们国家已经、正在、还将一项一项地起草通过法律。我们在建设一个法治国家。不按照这样的权力约束和法定程序做的，就是非法的。

1999年的这场运动，当著我们的面，当作我们的科学家、教授、法官、记者们的面，把我们原来设计的建设法治的大堤里的钢筋偷换成了竹条，由于陈旧而发霉的竹条。

我的好多好朋友质问我，李洪志说的很多话，明明荒谬，明明撒谎，为什么不批判，反而批评宣扬科学的教授，比如刘华杰教授。朋友们质问我还有没有是非观，还要不要坚持正确的观念，还有没有能力反对错误的观念。

我的回答是，在这样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事情，法律的公正比个人观点的对错更重要。现在，1999年，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要害是，我们面对的是一场不对等的“讨论”。

这场运动的发动一方完全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甚至垄断了一个社会为了公正必须令其独立和中立的司法资源。所有的电视、电台、报纸、杂志，所有的大学、科研机构、专家、教授，朝野上下铺天盖地先定性再找证据，先批判再说论据。而对方根本就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可能。一切反对的声音都被消音了。这怎么会有公正？当你的拳击对手被捆绑了起来，被堵住了嘴巴，被蒙住了眼睛的时候，你居然还有勇气出拳？这时候的出拳只显示了你的懦弱和卑劣，只会降低你的人格。不管李洪志先生过去说了些什么，不管法轮功的学员过去有过些什么，在法庭开始审理和判决以前，利用垄断的媒体造成舆论压力，无视一切起码的法定程序，剥夺上百万普通公民的言论和行动的权利，这对于这些普通公民是不公正的。在这样的时候，我拒绝再做一次“红卫兵”，我拒绝做追随者，我拒绝为虎作伥。

如果现在批判李洪志先生的人们真正相信自己是掌握真理的，那么，就放弃仗势批判的条件，站到和法轮功信仰者一样条件的场地上。你能发表文章，也让法轮功发表文章，你能上电视电台，也让法轮功上电视电台。你既然真理在手，就和你的批判对象按同样的讨论规则来辩论。八十年代，提倡科学的人们发不出声音，因为钱学森先生、张震寰将军、以及比他们地位更高权力更大的人信气功和特异功能，有“特异功能”的人可以进出中南海，可以在大学设讲台，可以开著配有警灯和警报的汽车在京城里横冲直闯，是他们压制了科学的声音，不跟你在同样的讨论场地上辩论。现在，既然科学的声音可以发出了，为什么不给法轮功同样的场地、双方按照同样的公平规则来辩论呢？

文革十年已经证明过一次。今天，我们对不公正仍然如此麻木，我们在等待下一次。今天上百万法轮功学员遭到的待遇，明天就会轮到我和你。

也许有人会举出例子来说，这些“邪教”活动中确实有犯罪活动，都出了人命了。难道人命不关天？是的，人命关天。但是，即使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还是有一个公正的问题。为了保证公正，还是必须强调司法程序，强调司法的约束和合法运作。即使是有确凿证据的杀人犯，你也不能剥夺他或她在法庭上辩护和按照法律申诉的权利。今天你剥夺了一个杀人犯在法庭上受到公正的审判，为自己辩护和申诉的权利，明天就会有人剥夺一个犯了小过失的人为自己辩护和申诉的权利，后天就会有人剥夺你，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得到司法公正对待的权利，被罗织罪名，被投入冤狱，被夺去生存权，你毫无反抗的可能，就象当年的刘少奇先生一样。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如果没有一个法治的制度保证，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谁都有可能轮到。我们不要忘记，当年宣布刘少奇先生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时候，不仅有党中央全会的决议，还有一本象模像样的“证据”，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下达，没有人怀疑这样确凿的证据。而我们要等到十年以后才被告之，所有这些所谓证据，全部是伪造和罗织的。

如果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的承诺是真诚的，就从现在开始按照法律程序来对待包括李洪志先生在内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让法庭独立办案。在法庭审理以前，禁止垄断性的舆论压力。在法庭上，保证被告得到可以信赖的律师的辩护和协助。法庭判决以证据为根据。按照已有的法律条款，在任何案件中，一人做事一人当，禁止搞株连。在法庭判决后，保证被告有上诉的权利。所有未判有罪的公民的

言论和行动的权利不受剥夺与限制。禁止搞人人过关的表态。禁止在工作单位里用政治思想工作的借口对任何人搞思想和精神的迫害。

现在，我们就应该能够看出，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认识误区在什么地方。刘少奇先生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从现实来说，国家主席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小民百姓更不用提了。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作为一个国家主席，正应该保障每一个小民百姓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怎样对待个人，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至关重要的，即使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保障了每一个人的尊严，再来谈国家主席的尊严。如果认为小民百姓的尊严是不重要的，“坏人”的做人的尊严是可以剥夺的，那么，保证社会公正的法治就不存在了。如果一个国家主席不曾作出殊死的努力来保证他的每一个国民得到公正的法律待遇，那么，当同样的灾难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怎么指望小民百姓来保护你呢？

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是又一次操练。一切是那样的遥远而熟悉，那样的似曾相识又浑然不同。有些人从这次操练中检验了再来一次文革的可行性。中国的民众，可以从这次操练中检验一下自己阻挡下一次文革的能力。让我们问一声自己吧。我们能阻挡下一次文革吗？这次操练证明，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比上一次文革再荒唐十倍的事情，随时有可能发生。我们阻挡不了，因为我们国家的法治制度还没有建设到这个地步，我们民众自己的法治意识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没有从57年和文革的挫伤中恢复过来，还没有勇敢到这个地步，我们的政治家还没有明智到这个地步。我们还要提醒自己一次，历史是不会真正重复的。论威望、论气魄、论谋略，过去和将来都没有人能达到毛泽东的水平。那么，如果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将会是什么呢？

□ 转载自《新观察论坛》1999年9月14日

∞ ∞ ∞ ∞ ∞ ∞ ∞ ∞ ∞ ∞

疯狂岁月中不寻常的“常识”

• 宋永毅 •

自遇罗克的《出身论》面世至今，整整32年过去了。悄然流逝的岁月无意中垫高了我们返顾历史的支点，以致不少理论家们黯然感叹：原来遇罗克为之献上他年仅27岁生命的，只是今天的常识而已。然而，重读《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却使我不敢苟同于上述的感叹，因为任何一种“常识”之所以能成为今日广为认同的常识，大多经历巨大的历史阵痛；尤其当常识违背了当权者集团的私利时，超前认定它们是常识的先驱者，常常会付出流血的代价。为布鲁诺和伽利略所坚持的“日心说”，恐怕今天只有神经失常者才会认为是异端邪说。但在三百年前，他们一人为之被烧死于罗马的火刑中，另一人则被判监禁多年。如果说科学上的常识总具有相对的超脱性，那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常识却可能与每个社会集团的社会利益密切相连。倘若懂得了这一点，便不难明白先驱者们为“天赋人权”这一常识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惨重。废除种族奴役和种族歧视，应当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人文常识。但美利坚民族为之献出了他们最优秀的总统（林肯）和最优秀的牧师（马丁·路德·金），并为之进行了一场历时五年的内战。废除等级特权，也应当是今天看来浅显的人文常识，但法兰西民族为之进行一场充满了血与火的革命。纵观世界的人权理论史，自公元前594年的“梭伦立法”到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人类已为之奋斗了近一千五百年，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儿女，而这一常识在当今世界的实现却仍远不完美……

作这一如是观，便不难懂得遇罗克的《出身论》的不寻常之处，以及它为甚么会激起那么大的支持或反对的社会震荡。《出身论》的核心是“平等”两字，即为

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黑七类子女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文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甚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揭示了统治者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这样，中共当时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泻面——成份与出身不好的人的险恶用心便昭示于天下了。

一种真实的常识的提出，常常是对另一种虚假的“常识”的颠覆。由于中共长期封锁与批判历史上人文主义的思想资源，又由于他们蛊惑人心的“革命宣传”、专政高压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等级专制的思想根基，导致既得利益者与多数被害者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视“阶级路线”或“血统论”为“常识”。然而，遇罗克却敢孤身一人高声喊“不”！他不仅给既得利益者们以当头棒喝，更给受害者送去了觉醒和反抗的思想武器。在那段黑云压城欲摧的岁月中，遇罗克的《出身论》完全无愧为一份黑暗王国中催人惊醒的人权宣言书，而这也正是当权者最不能容忍之处。年仅27岁的遇罗克正为此祭上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

在任何一种看似浅显的常识下，都不难发现不寻常的文化、知识和理论的深基。先驱者的宝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提出常识的勇敢，更在于他能发现常识的慧眼。和当时一般的年轻人只读报纸和“老三篇”之类的东西完全不同，遇罗克有幸在他失学的数年内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系统地读了大量西方人文哲学著作。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从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美学到卢梭的人权平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都下过苦功夫钻研。这些都培养了他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对已变成现代迷信的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在文革所有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中，遇罗克恐怕是极少数的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深厚西方民主主义理论修养的一个。尽管遇罗克一直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文章中深邃的西方现代的人权之光仍是耀眼闪亮的。这使他依靠人类最优秀的文化底蕴，一开始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坚决反对者。

正式发表于1967年1月的《出身论》曾一纸风行中国。不仅京城纸贵，三万多份《中学文革报》一销而空，而且广泛流传转抄于新疆、云贵这样的边陲远乡。如此广泛的传播度和认同性固然与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有关，但也从侧面说明了遇罗克的批判一开始便带有彻底的体制性和广泛的人民性。文革中具有异端思想或倡导异端思潮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如张志新、史云峰。他们的异端思想主要和中共上层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大都同情文革中被清洗的刘少奇等人而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也正因为注目于上层斗争，致使他们的思想从没有在文革中得到广泛流传，他们的名字在文革后的平反运动中才家喻户晓。第二类如杨曦光、朱成昭。他们都曾很 deeply 卷入造反运动和两派斗争，但他们或抓住深化了毛泽东在运动初期关于国家体制民主化的许诺，或在狂热后的静思中觉察到了毛、林之流的险恶，因而，他们倡导的异端思潮有一定的流传性和群众性，但又带着群众运动或左或右的印迹。他们思想的成熟和升华，常常是在受迫害以后。遇罗克则属于与众不同的第三类，他从不注目于上层的政治斗争，他更有意识地不卷入底层的派性斗争。例如，在写《出身论》时，遇罗克为自己起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他谈到这一笔名的源起时指出：“我不喜欢甚么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字。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万个家庭，希望每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在整个文革中，遇罗克自始至终没有沾上任何派性的边。

如果说“知识份子应当是社会批判的良心”这一命题是现代社会的常识的

话，那么，遇罗克在那个黑暗年代的所作所为正是一个中国知识者的楷模。可巨大的历史讽刺是：在如磐夜气中挺身而出的不是那些自30、40年代便声名显赫的文坛巨匠或科学大家，而是遇罗克——一个只有高中学历，年仅二十余岁的学徒工。以遇罗克的年龄、学历和身份充当“社会批判的良心”的知识份子角色，而且承担得如此出色，实在是疯狂年代中的历史反常和遇罗克个人的不同寻常。然而，对中国知识份子来说，这却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嘲弄，而且亦是一种良心的拷问：尽管他们有傲人的学历和复杂的专业知识，但他们是否缺乏分辨简单是非的常识，和提出并坚持这种常识的勇气？如果一个知识者缺乏这种最基本的常识，他是否算得上是一个有社会良心的现代知识份子？《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出版又重提了这一尖锐的问题。这不仅对文革中的知识份子，即便对今天的中国知识份子，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

□ 转载自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一九九九年八月号·第五十四期

~~~~~

【广阔天地】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如歌的行板——献给我的同代人

• 汪成用 •

(一)

从那一刻起，我相信了灵魂的存在。

空间一下子变得广博，意识也不再被装入一具有形的躯壳。一切失去了重量。我真的体验到了什么叫“飘”。与有人所说的那个世界中的五光十色不同，我所占有的只剩下两种颜色：乳白的，浆状地流动；幽蓝的，像一束激光在乳白中穿行。一个声音，一个熟悉的声音带著回声在似有似无中回荡。声波激起蓝色的振动，白色的涟漪在懒洋洋地延伸……，我努力扑捉著那熟悉的声音，一瞬间，抓住了记忆，——是母亲，是母亲的声音，在软软地重复著催眠似的安抚。但，讲的却是英语。

妈妈！那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一辈子辛劳勤俭的东方女人。

“The operation is over.”

“The operation is over.”

……

不知又过了多久，——其实，时间不再有意义，——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的笑很甜，轮廓清晰，画著淡妆，像是一幅小人书中的工笔画。她盯著我看了一会儿，欣喜地叫了起来：

“你醒了！”

醒了？我本来就没睡。

“你醒了！”她又重复了一遍，然后手舞足蹈地忙了起来。

我想挪动一下，但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不是我的，除了思维，我失去了一切。终于，我想起来了，我就是被她推进手术室的。她曾和善地告诉我，因为是颈椎手术，我的头发必须要剃掉。她让我吞下了两粒绿豆大小的药片，说，别紧张，就像睡一觉一样。我没紧张，心里充满了平静与好奇。我下决心坚持住，到要看看他们将如何发落我。

然而，我最后的印象，是坐在轮椅上被推进了忙忙碌碌的手术室。一排排的刀剪，不知是剃头用的，还是割肉用的……



再以后，就是这白色与蓝色。  
再以后，就是这张脸。  
再以后，……这回，我真的睡著了。

## （二）

母亲去世的那年，我已到了东北黑龙江。家里连著给我发电报，我居然连见也没见著。春播一过，指导员拿著一叠电报来找我。皇恩大赦，——我被批准回家了！

我第一次受到了死的震撼。妈妈平静地躺在一人多长的铁柜里，不再有用吸管吸去积痰时的痛苦。生与死之间实在是仅一步之隔。

二十天前，我像个孩子样地回北京，二十天后，我像条汉子样地回边疆。

收到关于办后事经过的那封家信时，干部们正在开会。

班长，勉强挤入干部之列，可实在是个送死的官，不但半点好处沾不著，还需处处带头，吃苦在先。我是个班长，因此荣幸地参加干部会。我想，我看信时大概是不知不觉地哭了。我溜出弥漫著烟草与脚汗味儿的会议室，绕到房后的墙脚蹲下，让眼泪痛快地流下来。

这一切没能瞒住一个姑娘的眼睛。她叫黄菲。

黄菲比我小两岁，也当了个送死的官。她在五班，我在八班。评先进，搞宣传，我俩都是活跃分子，因我能说她能写而被人称为“五班的笔，八班的嘴”，还有一个能干的班长在六班，——“跑不断的六班的腿”。

黄菲长得应该说很不错。尤其使人心乱的是那双眼睛。很可惜，那个时代的女孩儿才十五，六岁便承担了让人难以想象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人人要强，拼命，以后便很多人落下了病根。穿著则一律是“水桶式”，上下一般粗。我至今回忆不起那个年头儿的任何一个妙龄女孩儿有任何线条。

只有眼睛是遮不住的。

那天晚上，在开完干部会回宿舍的路上，黄菲叫住了我。万籁俱寂。只有远处点著油灯的宿舍里不时传来同伴们的嬉笑声。她的眼睛在一片星光下闪亮。

“你别太……我知道你……”她说著不成句的话，然后把一张小纸条塞在我手里，匆匆地转身走了。

纸条很简单，大致是：你家的不幸我都知道，无论如何请你保重身体，等等。只此而已，既无酸的，也无麻的。“五班的笔”呵！难道那只是用来写“四好总评”报告的吗？你的笔下本应流出自然奔放的感情。

也许，还有爱。  
可心涩，笔也涩。

几天之后，同样一个星夜，她又叫住了我。

这回，她用低得几乎无法听清的声音说：

“对不起，以后不能再……，指导员找我谈话了，说我在考虑个人问题……”

“个人问题”，那个时代的语言，可大致理解为一切与婚嫁恋爱有关的思想与行为。健康的爱必须是纵向的：爱党爱国爱领袖。爱父母，爱儿女，勉强说得过去。而横向的爱则为大忌。有戏为证：但凡英雄人物，必然是男嫠女寡。且不说李玉和，杨子荣，那是战争年代。可方海珍，江水英呢？柯湘的丈夫死了，阿庆嫂的丈夫倒是还活著，可惜跑单帮去了，也就是当“倒爷”，两地分居……

由于“爱”字实在是羞于启齿，故以“个人问题”代之。

黄菲在考虑“个人问题”！

……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我呆站在夜幕下，好一会儿才突然奔回宿舍，打开前几天开会时作记录用的本子。那里本应夹著黄菲写给我的“情书”。

“情书”不见了！脑袋“嗡”地一下大了起来。

二十年后，我还常常努力回忆著那勉强称之为“信”的小纸条的去处。根据物质不灭理论，它肯定仍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黄菲后来匆匆地嫁了人。到美国后的第二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知道了她的消息：因为嫁给了非北京人，她是我们那批人中最晚一个回北京的。而且似乎离了婚，男方坚持留下了孩子。屈指算来，她离开东北的那年已超过了三十岁。

### （三）

这回我可是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异乡”了。

在国内时，就是再苦再孤独，起码身后有个家。事情就是坏到底了，还有党来挽救。

可眼下，我只能把几种方案翻来复去地来回掂量：

- 一，找个中医扎扎针灸，可不知是否管用。
- 二，买张飞机票打道回府，可需要借钱。
- 三，再等几天看看进展，可度日如年。

绝望中想起哥哥当初说的：就是再穷也得留下买张飞机票的钱。

那年是我的本命年，都说本命年得格外小心谨慎。这不，不听人劝，大大咧咧，吃苦头了吧！

一次不大不小的车祸，使我的颈椎受伤。屋漏偏逢天下雨，我刚好在两个月前铤而走险，停买了医疗健康保险。

天下竟有这等倒霉事，怕什么来什么。悔呀！全晚了。

胳膊开始发麻，直立超不过三分钟。我不时地用针尖挑挑手指，看是否还有感觉。我六神无主，坐立不安，直到被在医学院作事的白先生连推带搯地送进了医院。

拍完X光片，我被告之稍等。可等等人不来。我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心情倒是平静了许多。不知过了多久，帘外传来嘈杂人声，隐隐约约地有人提我的名字，一种不详之兆凉凉地从脊梁骨升起。门帘掀开，起码六七个人涌了进来。院方知道我初来美国，怕我听不懂，居然还带了个中文翻译。领头的医生有六十来岁，问安之后把X光片一插，开始讲解。不少名词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反正是听不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很严重。

“那…… 我该怎么办？”

医生弯下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孩子，你现在像是站在一座快要塌了的楼下，随时都有危险。如果你是我的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作手术。”

“我……，没有钱……”

几个人相对无言。医生命令立刻给我上枷，把颈部固定。我就像是野猪林里被发配的林冲一样，悲壮地走出了会诊室。

医生送我出门，忧心忡忡地叮嘱了一句：

“早作决定。”

我还真被党挽救过一次。

我们十几个“京片子”是六八年七月响应号召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团某连的。其实，毛主席是半年之后才挥的手。我们是无“响”便“应”了。

正是麦收时节。十几个人便打著旗子径直开到麦场。十几个脸盆一字排开，水清凉。一个中年汉子笑容可掬地说：

“孩子们，你们到家了！”

话音刚落，我们领头的哥们儿，大名叫常艺，绰号叫香肠的小伙子竟激动得哭了起来。

说话者就是今后几年使我们大吃苦头的连指导员施仲英。不久便听人嚼舌头：他因诡计多端而闻名远近，人人叫他“施小鬼”。

我们是第一批到达的知青。第一，总是占便宜，就像家里的老大一样。可好景不长。没几个月，哈尔滨人，上海人，天津人……，纷纷而至。于是，“地方主义”成为一个时期内的重大话题。事情本来不大，可越说越大，终于引发了北京人与哈尔滨人之间的一场恶战。

那天晚上在食堂吃饭，因为一点小事口角，几句话不和，哈尔滨人首先动手。一时间满食堂板凳、碗碟横飞。一本地女青年手举小红书庄严宣读“要文斗不要武斗”，话音未落，一盘装著菜的碟子飞来，不偏不倚地砸在她鼻梁上。顿时血如泉涌，叫骂声、哭闹声，乱成一团。

不打不成交，这架一打，北京人与哈尔滨人倒成了朋友。于是大家一致认为：上海人最可恨。他们不但善搞领导关系，而且宁可饿肚子也不吃窝头。可没多久我们便服了。京片子们还自恃清高地吟诗作歌，乱发牢骚呢，人家早已占据了连里的重要职位：付指导员，文书，会计，……

政治局不也是上海人的天下吗？

我们对领导的不满随著地方主义的高涨而高涨，看什么都不顺眼，不时的给党

支部找点麻烦。我们的骄狂终于激怒了施小鬼。一场“反击一小撮人向党猖狂进攻”的运动，在施小鬼的肚子里转了起来。

于是，施小鬼拿出了绝招——引蛇出洞。他竟是这样对待“孩子们”的：他亲自跑到离连队三十里路外的放牧点，通知我回连参加“纪念北京青年上山下乡一周年”座谈会，并指名要我发言。“来回路上都算上工！”他大方地补充了一句。接著又破格邀请我们几个能说会道的参加整党学习班。不说白不说。整党，给党提意见嘛！我们还蒙在鼓里大放厥词呢，一份份反党分子的材料已整理成文。

有人说，历史是个被人嫖过一千次的婊子，一点不假。彭德怀在我们读的党史里被“嫖”成了主动发难、妄图篡党。毛泽东设下圈套引彭德怀钻的那一折自然不提。别看施小鬼不读书，悟性比我们这些书呆子强得多。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突然变得对我格外客气。就连成天和我过不去的小流氓茂子，也见了我就远远地躲开。人人脸上凝固着用皮堆起的笑。如与某人狭路相逢不得不打遭遇战时，对手常常是先问几句“吃了没有”之类的废话，然后便且战且退。

西方人以谈论天气来没话找话，至于“吃了没有”，那不关你的事。而中国的“吃文化”实在是根深蒂固，就是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这么问。——这是题外话。

我隐约发觉问题严重了。

一个严冬的晚上。那个冷劲儿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当地人告诫说，这种天撒尿，尿未落地就已冻成冰柱，因此得手持一棍，边尿边敲，否则冻上来必大伤元气。信不信由你。

我出门上厕所，忽听黑暗里有人叫我。定睛一看，是黄菲！我一时张口结舌。看得出她很紧张，眼睛飞快地左顾右盼，嘴唇哆嗦著挤出几个字：

“走，……上路走一走……”

没等我张嘴，她扭头便走。我跟著她，两人一声不吭，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冻成冰壳的小路上疾步而行。直到连队的灯光渐渐远去，她才放慢脚步转过头来。天那！她的目光冷得像那天的风一样。

“我等了你很久。”

“你……不冷吗？”

她不回答我，却单刀直入：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别装傻了！”她几乎喊了起来，“全连都知道了，下午开了动员会，现在人人都在写批判你的发言稿！”

虽然已有思想准备，我还是惊得眼睛冒出金星来。

“我……没有错……”

“算了！别拿鸡蛋碰石头了。其他连队还有人被抓起来枪押著送走，你……你不要命了！……也太狂了！”

“……”

远处，连队里传来阵阵狗叫，听得格外清晰。我想，大概是因为天冷，空气密度大，声音传得更远的缘故。

真冷啊！尽管是背著风走，脸上还是像一片片刀子在刮。

黄菲告诉我，按情节罪行轻重，在将被批判的四个人中，我排第二。其实，香肠是我们这一伙儿的头儿，但他性格直爽，有口无心，故排名第三。

“服输吧，你……”她的口气软了，变得近乎在求我。“施指导员说了，如认识好，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认了错，将来还可以……”

我心里一阵发酸，一回头，忽见两行眼泪挂在她那冻紫了的脸上，已几乎凝成了两条冰凌，眉毛上，头发上，挂满了白霜，像是一个从水晶宫里飞出的冰美人。

“…… 谢谢你。”

心快要被冻僵了。

“回去吧。”

我俩不声不响地走上归途。

远处，狗又叫了起来。

那天我林冲般地从医院走出来时的心情，并不比二十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冬夜好多少。脑子里一片空白，像是北大荒那单调的原野。直到我不知不觉地逛到系图书馆的门口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是来找吉姆的。

吉姆与我同在一个博士班，又是同一天入学。这个生长在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小伙子，承袭了古典英格兰式的绅士风格：深邃，善良。见面的第一天，他那双和善的眼睛像火花一样与我的目光撞在了一起。他走近我，向我伸出了手。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他说，是神使我认识了你。

我找到他时，他正埋在书堆里。砖头一样的书在桌上堆不下了，一本本翻开了铺在地下。吉姆叼著支笔，像只狗样地在地上爬来爬去。我没叫他，径直向他走去。可就在走近他的一瞬间，我后悔了。

再过两个星期，吉姆将参加博士资格考试。谁都知道，这个考试对博士生就像是鬼门关一样。考不过，卷铺盖回家。考过了，尽管吊儿浪当，拿学位尤如瓮中捉鳖。现在的分分秒秒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宝贵。

晚了。吉姆慢慢地抬起了头。他像不认识一样地盯著我，好一会儿，突然惊叫了起来：

“上帝！你怎么了？”

我努力搜寻著医生用的那些名词术语，结结巴巴地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吉姆的表情从惊奇到紧张，眉毛拧成了疙瘩，眼睛越瞪越圆。他愣了一会儿，突然一把抓住了我：

“走！跟我回医院，我要见你的医生。”

在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带著几分倦意的医生破格接待了我们。医生用低得使我听不清的声音向吉姆解释一切，吉姆不时地点头，表情僵滞。

医生转向我，和悦地一笑：

“这种手术虽大，但我作过多次，成功率很高，你不必担心。”

“那，手术后会怎么样？”

“这样说吧，”医生停顿了一下。“如果你再出车祸，脖子可能会从其它关节断掉，但绝不会再从这儿断。”

再出车祸从哪儿断我都不在乎了！

“我将从你的臀部取一片骨头，”医生接著说 “用一种特殊的金属钉子把颈椎固定。”

“那以后再取出那根钉子吗？”

“不，那根钉子就永久地留在那儿了。”医生机智地一笑。“今后你再过机场的安全检查门时可能会有麻烦，那个机器会叫起来。”

天啊！他还有心开玩笑！

吉姆紧闭双唇，医生的话他似乎没听见。他像一尊罗丹的雕塑，有棱有角的面庞像石头一样的凝重。

“好吧！”医生说 “我带你们去看看一个刚作过这种手术的病人。”

这实在是医生画蛇添足式的错误决定。天天与刀子剪子打交道的他，不会想到病人的那付鬼样子对我和吉姆的冲击。

病人半躺在床上，他的上半身打著石膏，四根铁条垂直地从封著石膏的胸部与背部竖起，连接一个比头大一圈的铁环，四根钉子一头连著铁环，一头钉进脑袋，使头部向任何一个方向的转动成为不可能。病人一动不动，那样子简直像是星球大战中的外星人。

吉姆在看到他的一瞬间，身体晃动了一下，紧接著腿一弯，一屁股坐在了地下。他的脸色苍白，一粒粒豆大的汗珠劈里啪啦地滴落下来。

护士们一阵忙乱，把吉姆扶到椅子上。吉姆嘴里叨唠著：

“……没什么，没什么，……真对不起，我这几天没睡好……”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吉姆虚脱的原因：医生告诉他，我裂开的颈椎骨离伤及中枢神经仅隔两毫米。

从医院出来，吉姆逐步恢复了正常。他微笑地安慰我：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这样，我先送你回宿舍休息。你的医疗保险的事，让我来试试。”

吉姆回到宿舍，拎起一部拨盘式的老电话，盘腿坐在床上，翻开电话黄页，开始了持续整整一天的电话马拉松大战。

第二天的下午，吉姆一阵风地冲进我的宿舍。他像个刚刚在奥运会上创下记录的运动员，兴奋地挥著双拳：

“成用！你的保险办好了！”

“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蓝十字会同意卖给你保险，生效期正好在你的车祸之前！”

我愣住了。这几乎是天方夜谭，没有一家公司会干这种傻事。可这又是千真万确的，我发誓，是真的。说实话，我至今没搞清楚吉姆是用什么办法为我争取到这

份保险的。我只知道他十几个小时都在电话上，顽强地东撞西撞。他向我伸出用来拨电话的食指：

“看！这根指头练得棒极了！”

他开始手忙脚乱地帮我收拾衣物。

“走，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 （四）

说不清是期盼还是惶恐，那飘动著乳白与蓝色光环的世界……

每天晚上都作差不多的梦，不是别人追我，就是我追别人。而结局大体总是欲进不能，欲喊无声……。一阵剧烈的头痛把我从梦中唤醒。我本能地把手伸向胸口去寻找安全感——那生命的律动。可触到的却是，硬的，冷的。那是什么？噢！那是我的骷髅。骷髅拥抱著我，我拥抱著骷髅……。我想换个姿势，躲开这奇异的怪想，却动弹不得。我攥紧拳头，百般努力地想辨明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急出了一身汗。胸口像压著块巨石，窒息中我挣扎著，与“我”搏斗。一种深切的无能为力捆梆了手脚，周围的世界开始下沉，……他妈的！……我不能就这么完了！难道生命真的就这么脆弱？我急了，用尽全身力气重重地吐出一口恶气。哗啦一声，四周光亮了。像一记重重的敲击之后，不肯散去的余音终于渐渐地弱了下去……。我摸到了床边的桌子，用力支撑起沉重的身体，摸索到了临睡前备好的止痛药与水。似乎有一种战胜感的满足，我又昏昏睡去。

随著咚咚的跳动，我呼唤著那片土地，又一次回到了那个寒冷的冬夜……

与黄菲在离连队一两里的地方分了手。抱著一线希望，我决定“以攻为守”，主动去找施小鬼，看看是否还有转机。

敲开连部的门，施小鬼见到我并不惊奇。

“你去哪儿了？”他劈头盖脸就问。

“我……没去哪儿，……去厕所，拉屎……”

施小鬼的三角眼突然放出了光，从牙缝儿里挤出的笑透著凉气。他出人意料地为我摘下帽子，和善得让人发抖。

“看看，看看，帽子都冻成冰坨子了。真是的，冻坏了吧？”

他的拿著帽子的手在空中慢慢地划了条弧线，把帽子放在冒著热气的炕上，目光却一刻也不离开我的慌乱的眼睛。

完了！拉三泡屎帽子也冻不成这样。

懊丧突然变成绝望的愤怒，我叫了起来：

“我到外面走了走！怎么了？这点儿自由都没了吗？你们到底要拿我怎样？！”

“别急，别急。”施小鬼的声调出奇的平和，浑身都是强者的冷静与自信。“用不著我说，几天内见分晓。至于要拿你怎样——”他凑近了身子，一字一句地喷出满口大蒜和著的酒香：

“全看你自己了！”

我知道了，事情已无挽回的余地。

那一夜，我第一次吃了安眠药。

几天之后，全连召开了“反击一小撮人向党进攻”批判会。党念我们年轻，坐著接受批判。

整个批判会高潮迭起，群情激奋，不愧为施小鬼的一个杰作。应该说，他作了周密精细的准备，几百号人被党发动得热血沸腾。

我一直低头盯著脚尖，冥思著我的罪行，直到听到那个刺痛的声音。

黄菲。是她！

我抬起头，目光模糊了起来。

是她！黄菲。

她的声音清脆，坚定，却是那样的陌生。也许因为天冷，两三页纸的发言稿在她手中微微抖动。

平心而论，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字里行间义愤填膺，又不失逻辑的力量。她夹叙夹议，既有事实，又有分析。她的声音抑扬顿挫，跳跃著动人的节奏，溶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那不可遏制的愚昧的洪流，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可渐渐地，那义正辞严的声音逐步失去了内容，似乎变成了听不懂的语言，只剩下了无意义的音节组合，像一首动听的奏鸣曲。

她的发言被一阵阵声嘶力竭的口号声淹没。黄菲长吁了一口气，收起发言稿，辐射式的伞状目光突然聚焦，迅速向我投来荒凉的一瞥。然后转过身，大步走下台去。

我始终认为，那一刻她的目光虽然冷漠，但却充满了人性。她真诚地加入了挽救我的行列，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感情，自己的一切溶入了她所坚信的正义的事业。

也许，是扭曲了的人性。

## （五）

我正想著他呢，他来了。高大的身躯几乎把病房的门遮严。

他的眼光永远是那样的平静与和谐，像是北加州那永恒的蓝天。他微笑地向我伸出手：

“祝贺你！手术很成功。”花白的胡子无言地抖动了一下，递上一束鲜花来。

啊！……

一个入学不久的外国学生，面对指导教授送来的鲜花，一时不知所措。

我的老师，年近七旬的史密斯教授。

我是在上海认识他的。开放不久的中国热情地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刚刚毕业于音乐学院，操著英语九百句初级班式的口语，战战兢兢地向史密斯教授递上了我的作品。没想到教授第二天在校园里到处找我。他用三十三转的速度放著七十八转的唱片，一字字地进出最简单的单词。

“你很有才能。这是我的通信地址，以后如需要我的帮助，可尽管来信。”



就这样，我顺利地成了史坦福大学音乐系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世界权威性的格罗夫音乐大辞典中有教授的一个不长的条目。介绍很简单，远不如其他美国名作曲家那么风光。他似乎也有过风光的青年时代，而今却隐居于风景秀丽的史坦福大学，与世无争地潜心研究著计算机音乐。

“我见过你的医生，”他讲话永远不快不慢，像一个自信的指挥家打著稳健的拍子，很少有什么事能使他生气或激动。“手术之前你很危险，感谢上帝，现在一切都好了！”

“可教授，这学期的课……”

“是的，有些麻烦。”教授望著窗外如画的校园，“你身上的石膏三个月内不可能拆掉，上课是不现实的。……也许，可以选修曼陀林？”教授仰起头在空气中弹拨了几下，弹出一缕黑色幽默来。

我笑了，可并未带走忧虑。

“……我的学生身份，还有奖学金……”

“我和外国学生顾问谈过，”教授顺手把那束花插进花瓶。“这学期如不注册，对你的学生身份没有影响，这点你不必担心。可是……”，教授停顿了，似乎很不忍心说出下面的话。

小小的病房里充满了花香。呵！丁香花。那一定不是从超级市场上买的，而是教授夫人从家里的花园里采的……

静谧凝入那淡淡的悠香。

“可是，如不注册十二个学分，奖学金不能继续。”教授终于开口了。

“那以后……”

“一旦中断，今年不再有机会，明年需重新申请。”

不！无论如何我不能失去这份奖学金。我在心里暗暗地喊了起来。

“教授！”我努力想支撑起沉重的身体。他的一双大手搭上了我的肩膀，示意我躺下。“我能上课。相信我，我能上课，我什么苦都吃过！”

“我知道，我知道。让我想想。这几天你安心休息，不必担心任何事。”

他再一次与我握手，转身告辞。

两天以后，史密斯教授高大的身躯又一次出现在病房。他胸有成竹地微笑著，像是一部深谋远虑的计算机成功地运行了一组程序。

“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你这学期的课程。你曾和我谈过中国古典诗词的结构与古典音乐曲式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请你把它整理出来，可作为一门自修课的论文，我作你的指导老师。我与谦宁教授谈过，他允许你在家读完他所要求的两本书，期末与他讨论，不必去课堂上课。再有，”

教授略停了一下，盯著我的眼睛。“明年春天，旧金山湾区将举行第二届汉纳作曲比赛，你若参赛，可作为一门作曲课。这样，一共十二个学分。”

“好！我一定参加比赛！”激动涌上了喉咙，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

“唯一的要求是——”教授站了起来，眼里闪烁著对他的学生的信任，颇有些元帅点将的风度。“作品必须在四月份的获奖音乐会上公演，才可算注册学分。”

这是系里讨论的结果。”

“几个作品可入选演出曲目？”

“前三名。”

……爱也罢，恨也罢，抹不去的黑龙江。黑水在蓝白世界那乾枯的土地上流淌，清凉的水湿润了我的嘴唇。呵！下雪了。雪片飞进了梦乡。融化了，融化了……。融入深秋月夜那低声吼叫著的江水。那一夜，我真心地相信我是在屯垦戍边。没有子弹的苏式七九步枪坚定地斜跨在胸前，像根烧火棍儿样地庄严。那个六八年十月的寒秋之夜，面对深不可测，令人恐惧的江水，我庆幸著与家庭划清界限的英明选择。这颗心糊里糊涂地跳了十几年，总算混出点儿人样来。知道吗？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生命啊！……

……恨也罢，爱也罢。曾几何时，昨天的黑突然变成今天的白，梦寐以求的宏伟理想转眼间成了饭后茶余的下酒小菜。浩浩荡荡地下去，溃不成军地回来。云里雾里地朝三暮四，忽来一阵风，把身不由己的老三届吹到了大洋彼岸。这不是捉弄人吗！你也太不严肃了，历史！多少理想，多少失落，多少喜悦，多少伤痕，……人都快折腾老了，可回头一看，什么也他妈的不明白！……我想唱歌，却不知不觉地哭了出来。唱吧！除了语录歌就是“舵手”与“恩人”……

呵！下雪了！雪片飞进了梦乡，……加州从不下雪，那分明是我生活过的雄浑的北方。有朝一日，我要回去，是的，我要回去看看那遗恨的边疆。

就这样！……

这觉，睡得好累啊！

我摊开了五线纸，一本正经地说，我要作曲。

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别有用心地作曲——我非要进入前三名。

我觉得我完了，根本作不出什么曲来。

于是，我眯起眼睛，让目光散开，铺平在一片绿色上。飞起来呵！让本能唱歌。去他的前三名吧！让心灵随便唱点儿什么啊，……见鬼！你不是“很有才能”吗？

渐渐地，那绿色流动了起来，没有起点，没有终点，也没有对比，节奏中庸，像是生命那单调的脚步。

那一瞬间，我抓住了感觉——呵！如歌的行板。

眼前一亮，血涌向头部，一阵无可言状的激动。被称为灵感的那个玩意儿像婴孩一样地在母腹中骚动不安，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时而伸手可及，时而远隔重山，时而像朋友般的亲切，时而像路人般的生疏。可惜呵！柴可夫斯基曾以此题作为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顾不得这么多了，我喜欢这个标题，这个意义深远又毫无意义的标题。或者说根本不是标题的标题。……“如歌的行板”……我居然忘记了那倒霉的颈椎，从床上一跃而起，兴奋地踱著步。

那神奇的白色又浆状地流动了起来。我相信是上帝给了我启示。那分明是大提琴透明的泛音牵动著那一缕缕白色旋律织起的网，长笛的中低音区带著粗糙的漏风似的气息，吹拂著幽蓝色的光环，……

我抓起笔，让冲动从笔尖流下来，流下来……

一时间，史密斯教授给我上课时的神情在眼前浮现。他坐在钢琴前，却并不触动琴键。他的嘴唇微微地一张一合，飞快地翻动著谱子，像是在嚼著我的音乐。

随著嘴唇的一张一合，旋律从笔尖流下来，流下来……

教授的才能是显而易见的，他年轻时写的作品精彩非凡。我曾拿著他在法国留学时写的作品去找他，请他讲解。他却淡淡地一笑：

“这是很久以前写的了。”

“那您为什么以后不写了呢？”

他似乎有难言之苦，好半天才勉强挤出几个字来：

“我……没时间……”

是啊，他为什么以后不写了呢？凭他的才能本应是个世界级的作曲家啊！

我突然发现，教授的气质，趣味，甚至他那渊博的天南海北地神侃，都奇妙地影响了我的写作。那色彩性的音块，扑朔迷离的旋律，也许像是法国派。至于东方情调，那是我的血液我的根，是永远也无法忘怀的情思。

我一天到晚念叨著我的“如歌的行板”，忘记了手术之后的阵痛。

在音乐中，我重生了。

飘飘然，飘飘然，我要把那咚咚的脚步，那吹越大洋的风，那挥之不去的纠缠我的北方情结，溶入这歌里去……

## （六）

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居然无声无息地不了了之了。

后来才弄清原委，是一个不知名的姑娘救了我。姑娘在东北某农村插队，被干部们轮奸，因乱吃堕胎药而死。她若是市井之民的子女，也许此事便流水般地过去了。谁让她乱吃药！可那些倒霉的干部们啊！——她是个高干子女，爸爸是个比他们大得多的干部。幸好中国不稀罕西方民主，法律也根据形势颇具弹性和威慑性，用不著闹腾什么 O. J. 辛普森之类的诉讼，让坏人钻空子。此事触怒了党，一句话下令枪毙了参与轮奸的干部，发出了保护知识青年的文件。

施小鬼接到了上级通知：我们几个“反党分子”应在被保护之列。据说施小鬼不服，拍著桌子吵，可终于识时务了。

我获救了。

上面的党挽救了我们这些正在被下面的党挽救著的反党分子。

反党分子们还没搞清楚是否该对下面的党的挽救采取被挽救的合作态度就被上面的党以否定下面的党的红头文件而挽救了出来。

反正是被党挽救了。

我最后一次见黄菲是在七四年的夏秋之交。

那一年，我像当年拼命要来一样，玩儿了命地要走。终于，我上大学了。那天

，我兴奋地在宿舍里转著圈儿，突然想找个地方发泄。我一路小跑，冲向荒无人烟的田野。

面对一望无际的油黑的土地，我第一次点燃了一根烟，喷一口呛人的辛辣，我大笑起来。

妈的！你小子也有今天啊！去你的吧！北大荒。六年啊！快成出土文物了。老子这辈子再也不想见这鬼地方！……妈的！

骂累了。我豪迈地撒了泡尿，突然心里涌上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眷恋……

走的那天，十几个哥们儿为我送行。人群里挤出了黄菲。她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放松与开朗。我要走了，她要嫁人，名正言顺地考虑“个人问题”，用不著再躲躲藏藏，生怕人家在背后戳戳点点。

她大方地向我伸出了手：

“祝你前途无量。”

“祝你生活幸福。”

“我嘛，”她淡淡地一笑“凑合著过吧。”

“……”

一阵沉默。

“还记得最冷的那个晚上吗？和你走在这条路上……”她打破了沉寂。

“当然。”

“还记得你说的那句话吗？”

“哪一句？”

“忘了？”她调皮地一笑，“忘了就算了。”

车要开了。在我转身上车的一瞬间，黄菲突然五味俱全地冲我喊了一句：

“石头蛋子，滚吧！”

啊！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我一边想著即将到来的厄运，一边无聊地把一块块石头踢来踢去。

“你看，人的命运就像这几块石头一样，”黄菲忽然柔和地说，充满了无奈与凄凉。“你踢著无意，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有的从沟里滚到路上，有的从路上滚下沟里。”

我无心与她讨论哲学问题，只是更使劲儿地踢飞一块石头，像是要踢飞我自己的命运。

“石头蛋子，滚吧！”我吼著。

斗转星移。

六年之后，不知被谁踢了一脚，我就这样滚出了北大荒。

黑土地，那留下一代人酸甜苦辣的黑土地，在车窗外渐渐远去。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再见！黄菲。

(七)

我至今认为是侥幸，“如歌的行板”获第二届汉纳作曲比赛第一名。

演出的那天，在音乐会中场休息时，我见到了史密斯教授。虽然我的作品被安排在音乐会的下半场，教授却早已听过了作品的排练。他大步向我走来，带著那永远的微笑向我伸出了手：

“祝贺你，作品写得很不错！”他微皱著眉认真地说，像是在回忆著作品的排练。“既有东方情调，又有西方技巧，很有意境。”

“教授，请提提不足之处。”

我们买了两杯饮料，他像是喝酒似地小呷了一口，略微沉思了片刻。

“高潮处似嫌不足，整体上欠缺一气呵成的气息。”

我正掂量著他的评价，教授突然放慢了语调：

“其实，我虽是你的作曲老师，可从来没教过你什么。实在是很不幸，作曲，是无法教的。这是我，也是所有作曲老师的悲哀。”

我吃惊地望著他，他的脸上泛起我从未见过的表情。

“你不是曾问我为什么不作曲了吗？我年轻时是那样地热爱作曲，可是越学习古典大师的作品，我对作曲就越失去兴趣。我们不可能超越大师的天赋。好的音乐都被他们写光了。当代作曲家能作的，不过是挖空心思玩弄各种新鲜技巧。我不知道那算不算艺术。我们这个时代，实在不是艺术的时代。老实说，我找不到作曲的意义……”

他的声音像一条平静的河，但却如此强烈地震撼了我。一瞬间，深埋在教授心底的失望坦诚地掀起一束细细的浪花来。

音乐厅的灯光渐暗。教授像突然从梦里惊醒一样，片刻间关上了心扉。

“呵！对不起，我向你说明这些干什么。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作曲家。”

我们一起走进音乐厅。

“预祝你的作品演出成功！”

可我已经失去了听自己的作品首次演出所应有的激动。教授的话搅得我心里七上八下，几个月的含辛茹苦一时吐出思绪万千，随著那细细的浪花跳跃……

一阵掌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机械地走上台去，向演奏员们握手道谢。同时接受一笔奖金。老实说，自从到美国后，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一张支票。它足以支付我在住院期间医疗保险所不能支付的那笔费用。也许，这就是作曲的意义？……

坐在前排的史密斯教授还是那样不快不慢地微笑著拍手，频频地向我点头。我突然想起在教授家里看见过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骑在摩托车上，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坐在车后，伸出又白又长的胳膊，搂著小伙子的脖子。

“在法国留学时我和爱迪丝就是用这辆车跑遍了欧洲。啊！年轻时真好！我真希望永远年轻。”

教授！你的心永远也不会老。你用你那颗善良聪慧的心，教我如何用世界性的语言去爱世界。这难道不是用生命在作曲吗？

嘿！我看见了吉姆。他使劲儿地跺著双脚，手作喇叭状，大声呼喊著我的名字。

这个吉姆！浑身弥散著东方式的“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后来我才知道，我动手术的那天，他在医院的咖啡厅里整整呆了七个小时，不停地为我祷告，等待著我的消息。一个星期后，他参加了博士资格考试。谢天谢地，他通过了，否则我真要内疚一辈子。

演奏员们也很高兴，不断地在我耳边讲著恭喜的话。大概这勉强可算得古人所说的“金榜题名时”吧？我还奢求什么呢？我尽管失去了很多，可命运对我还是不薄。令我不解的是，每次历尽千辛万苦所争得的成功，却并没给我带来多少兴奋与激动，反而伴随著难以言表的失落……哎！你小子真他妈的莫名其妙！

面对掌声与北加州的鲜花，我平静得令我吃惊，平静得苍白而又空洞。

我只想静静地，静静地溶入那广博的，蓝白相接的空间去……

室内余音绕梁。  
窗外已是春色满园。

春天，是少女的失恋。冰川拒绝了四月的挽留，默默地化作了北方的云烟……

#### （八）

我离开史坦福大学已经多年。

年年圣诞节，我都会收到史密斯教授夫妇寄来的自己制作的贺卡。那一幅幅功力深厚的钢笔素描，凝聚著来自西海岸的诚挚的问候。

教授现已退休。教授夫人爱迪丝，原来是加州某大学的美术教授，现也解甲归田。老两口居住在史坦福大学附近一幽静的寓所中，弹琴作画，安度晚年。

至于吉姆，毕业后几番苦斗，终于在一次招聘中击败了上百名竞争对手，在明州大学取得了一席钢琴教授的职位。但他似乎不喜欢这个工作，一年半后，他辞去了辛辛苦苦争得的职位，带著妻子与两岁的女儿，全家移居东部。

路经芝加哥时，他们留步到我家来看我。吉姆告诉我，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且身体不好。这是他想回东部的主要原因。

我与妻子招待吉姆全家吃了一顿丰盛的中式晚餐。吉姆一边大口吃著，一边不断重复著几年前在史坦福时常说的那句话：

“呵！这么好吃的菜，我要被你宠坏了！”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吉姆的女儿。第一次是两年前的在史坦福大学的医院里。吉姆的妻子早产，女儿生下时不足两磅，活像一只褪了毛的鸡。在暖箱里生活了几个月，她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小女孩儿亲昵地搂著我，好像知道我们曾见过面。

这个小东西！两年前还不知死活呢！

我见天色已晚，劝吉姆留宿一夜。可他执意不肯，说是特别习惯夜间开车。

要走了，吉姆忽然神秘地一笑，摸出一个包装精制的小盒，塞在我的手上：  
“送给你！给你个意外。”

他热烈地拥抱了我与我的妻子，跨进车里，挥著手发动了车。

我好奇地拆开小盒，呆住了。——一盒录音带，是吉姆在明州大学邀请五位音乐家演奏我的“如歌的行板”的演出录音。

吉姆！我的朋友。……

一颗闪亮的流星飞过，点燃了密执安湖畔的万家灯火。送走了依依不舍的晚霞，夜色降临……

生命，就是一首歌。是一首谁都想永久地唱下去但事实上又不得不终结的歌。谁都想把这歌唱得惊天动地，唱得随心所欲。可人们最终发现，尽管有的歌潇洒，有的歌沉静，有的歌飘逸，有的歌深邃，但那旋律的源与流，来胧与去脉，却是歌者永远也无法驾驭的。

这正是生命的痛苦，也是生命的魅力。

唱下去吧！管他是唱给别人听的还是唱给自己听的，只要相信那歌是从心底流出的，和著真诚与坦白，就唱下去，勇敢地唱下去……，不快不慢地走，踏著生命的律动……

望著那装满行李的小车渐渐消失在夜幕里，我从心底里深深地祝福著他：

吉姆，祝你幸福成功，永交好运！

□ 美国芝加哥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三日  
三十年前的这一天，我与上千个北京青年一起，离开北京，奔赴北大荒……  
~~~~~

【研究报告】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八）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第九章 上海新思潮：在炮打张春桥的背后

1967年1月28日和1968年4月12日，上海地区的造反派红卫兵掀起过两次大规模地炮打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的热潮。参加炮打的有红革会（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三司（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炮司（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以及不少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参加炮打的红卫兵几乎涵盖了当时上海地区最主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而且在仅一年多时间内重复了两次。

上海地区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触发点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所谓“一月夺权”运动。作为知识分子的张春桥深知学生红卫兵远比工人造反组织难以在思想上与行动上驾驭，因而在这次“权力再分配”中处处排挤造反派红卫兵。另一方面，自以为是天然左派，又深受“怀疑一切”思潮影响的上海造反派红卫兵又正处于不可一世的

鼎盛时期，他们那里忍受得了张春桥的冷落与排挤？由此，由炮司的核心战斗组——复旦大学“孙悟空”战斗组发起，1月14日在复旦校园里贴出了《一问张春桥》、《二十问张春桥》的大字报，掀起了第一次炮打的序幕。接著，红革会扣押了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等，引起张春桥于1月28日凌晨派遣军队去复旦大学进行镇压。这无疑火上加油，掀起了全市性炮打的序幕。当晚，全市炮打的红卫兵策划召开十多万人的反张大游行，并在上海工业展览馆责问张春桥、姚文元达六小时。自然，毛泽东及文革派是决不会允许年轻狂热的红卫兵把矛头指向他们的。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即以极为严厉的口气发“特急电报”给复旦大学红革会，指责他们“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是完全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1〕伴随著这一电报而来的自然是血腥的镇压。尤其是张春桥，表面上一再说对炮打他的红卫兵一概不算帐，背后一再下令进行残酷政治迫害。

迫害使人成熟。尤其对于卷入狂热政治漩涡的年轻人来说，残酷的政治迫害无疑如一盆当头浇来的冰水，使他们开始被迫冷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这种思考的结果之一是1968年4月12日对张春桥的第二次炮打。与第一次炮打不同的是：1）这些年轻红卫兵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反迫害色彩，而决不仅仅是“权力再分配”中的资源多少之争；2）在亲身痛苦的经历中，他们确实认识到了张春桥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尤其指责了他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然而，揪出一个张春桥还只是浮面的，在当时上海红卫兵，尤其是红革会的炮打中，更多的是一种反迫害的激烈发泄，以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如张春桥）的思路炮打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行动，在理论上与思想上还没有太大的突破。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复旦大学红革会核心战斗组《立新功》的大字报中，仍出于派性式“阶级斗争”的立场，把上海的异端思潮组织东方学会，反复辟学会以及炮司的胡守钧等人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称为“反对上海市革会的逆流”，“时而极左，时而极右，从各方面来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2〕这不能不说是这又一次轰轰烈烈的“炮打”的非常大的思想局限。

迫害使年轻人的成熟不仅仅表现在对某一特定文革派首要人物的反抗，更可贵的是表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整个理论问题的独立思想。自1967年夏至1971年，复旦大学炮司的胡守钧、周谷声等人就以“读书会”等等形式，开展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政治斗争的黑暗”等等问题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这批最早策划二次炮打张春桥的年轻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权力斗争”，“红卫兵是被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利用的工具”等等。他们私下传阅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斯大林时代》等书更使他们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国家体制进一步法西斯化的作用，并开始对西方民主政体有所好感。〔3〕这些活动代表了年轻一代思想觉醒的开始。张春桥当然不能容忍他的老对手们的进一步反抗。于是，1970年春，一场全市范围清剿“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运动大规模地展开，无辜牵连受害者达千人之多。胡守钧本人更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判处十年徒刑。〔4〕

迫害造成思考，思考产生异端。在上海参加炮打张春桥的红卫兵中，在文革中形成了异端思潮文件的有红三司的“反复辟学会”和“中串会”二家。“反复辟学会”由原来复旦大学红三司炮打张春桥核心战斗组（反复辟）的学生骨干陈琦惠、胡安宁等组成。在他们的“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中，有二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强调独立的“善于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大革命的学说，一边搞运动，一边搞理论”，要进行“理论性的创造”。在组织成员上，它“尤其欢迎加著狂妄称号的‘狂妄人’参加”。〔5〕当时的中国，革命理论的创造力无疑是由毛泽东及其文革派为代表的“党中央”垄断的，而“反复辟学会”却要去争夺这一“创造力”，毫无疑问是犯了大忌的。在组织上，它要公开吸收除学生外的工人、农民、干部中的“狂妄人”来一起进行这一创造，自然更是离经叛道了。其二，这一“宣言”强调“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阶

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具体如何变动呢？虽然在〈宣言〉中未加说明，但在他们的私下议论之中，他们认为：“每一场大的急风暴雨的政治风暴的政治运动结束，少则几个月，十几个月，多则几年，都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有领导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复辟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攻倒算的例子”。因而，他们准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革命的对象又是谁呢？按张春桥等人在迫害他们时的理解，自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6〕

与“反复辟学会”相比，中串会（“中学运动串连会”）的异端文章更具明晰的理论色彩。中串会原是上海地区与张春桥扶植的“中学红代会”对著干的一个松散的中学运动串连组织。自1968年初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中学生理论家毛兵加入后，与红鸥、杨志东、魏威等中学运动中的炮打积极分子一起办了一份影印版的《红卫战报》。毛兵在这份红卫兵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他自己对文革作了些独立思考的文章。其中较著名的是一发表即遭到张春桥、徐景贤等人严厉批判的《一切为了九大》，与风行1967至1968年间的“新思潮”相比，《一切为了九大》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只是重申了“阶级关系变动论”，所谓：“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7〕而在这“怪现象”前面，毛兵等人还加上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界”这一限制语。应当说，自1966至1967年间的代表中共中央的两报一刊社论中也有不少这一提法。为什么在1968年春一个中学生的一篇传单式的文章，要引起如此兴师动众的批判呢？原因非常简单，1968年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他们仍要使用旧的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即他们首先要抢党权。这样，再讲“党员不如非党员”自然是离经叛道了。《一切为了九大》的作者被“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逮捕达数年之久，因这篇文章而株连受迫害的也达数百人之多。

如前所述，尽管文革中上海近十万造反派红卫兵有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壮举，但在思想理论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有价值的文献。然而，在一个以毁灭一切价值为其宗旨的失重的年代，任何一点思想的闪光都应是难能可贵的。

注 解

〔1〕转引自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352—353页。

〔2〕见复旦新闻系《立新功》战斗组〈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3〕参见当时上海市委颁发到每一基层组织的《关于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材料》（1970）。

〔4〕1978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确认“胡守钧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遭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政治迫害”，“宣告胡守钧同志无罪，恢复名誉，予以平反”。胡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哲学系。

〔5〕〈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6〕〈关于反动组织反复辟学会的第一批材料〉，上海：《复旦战报》，1968年3月25日。

〔7〕〈一切为了九大〉，上海：《红卫战报》（影印版），1968年3月。

（第八章未完待续）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 (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曾 敏 (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 边 (芬 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李健民 (澳大利亚)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赵 桦 (美 国)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 (美 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 (美 国)	<cnd-cm@cnd.org>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 hz 或 gb-uu 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 请致信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 服务站地址: [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ftp://207.151.78.100/pub/hxwz)
[canada.cnd.org\[142.132.1.13\]: pub/cnd/hxwz](ftp://142.132.1.13/pub/cnd/hxwz)

WZ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